

莆田市文史资料

第 三 辑

濮初



148/17

莆田市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福建省莆田市委

一九八六年六月

目 录

为纪念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开馆典礼志感·····	蔡园 (1)
回忆省委书记王海萍同志·····	黄一石 (2)
回忆“四·二五”清江事件·····	陈元兰 (7)
忆念亡友吴钰荪同志·····	张兆汉 (11)
从台湾到闽中·····	薛秋帆 (14)
我为闽中国共合作所做的一件事·····	黄士豪 (20)
党领导下莆田盐民进行反压迫斗争的片断记述 ·····	李国柱口述 郑景樵整理 (23)
新、马兴化侨领陈耀如事略·····	(29)
兽医学家郑庆端·····	林懋忠 郑炳同 (32)
我所认识的画家李霞·····	郭骥 (35)
谈李耕与“仙游画派”·····	李朴 (44)
马来西亚兴侨文化人陈晴山传略·····	士希 (49)
宋湖民先生诗稿序·····	黄寿祺 (52)
刘春曦与厦港炮台·····	黄寿海 (54)
神炮手刘燕·····	刘正英 (57)
记仙游中医施启谟·····	林瑞涌 (61)
涵江藏书家康修其事略·····	康文芳 康永福 (65)
国民党农林部福建滨海垦区管理局在莆田设立珠江垦区的 回忆·····	罗文祥 (68)
清中叶间涵江海运业概述·····	蔡麟 (75)

莆田电力事业的早期发展史·····	余祖燕 余祖熙 (79)
“小上海”时期的涵江商业·····	蔡麟 (83)
兴化商帮在福州·····	郑桂芳等 (88)
莆仙人民反对民军野蛮统治的斗争·····	陈侃 (102)
解放前的仙游地方政治·····	陈侃 (114)
陈仪主闽时的四区专署两公案·····	文如许 (121)
近年来国家出版的兴化古籍简介·····	蒋维桢 (125)
莆阳四大佛刹史话 (续一) ·····	杨美煊 (133)
对《时论》旬刊的片断追记·····	刘鸿仪 (146)

为纪念新四军军部旧址

陈列馆开馆典礼志感

蔡 园

泾川林海招行客，
问讯舒溪章渡头。
云岭横空遥见日，
桃潭镜心月更幽。

杜鹃谢却桂着花，
五上云岭似闻笳。
仰瞻陈馆心犹壮，
瘦马长蹄又天涯。

回忆省委书记王海萍同志

黄一石

编者按：王海萍同志，广东海南岛人，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生。一九二七年秋，由党中央派来福建工作，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是一九三〇年智破思明监狱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一年七月，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兼军事部长，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中山公园被捕，不久牺牲，时年二十八岁。

一九三〇年，他与邓子恢同志同来莆田，对莆田的武装斗争，一贯很关心，因此特地发表黄一石同志对他的回忆录。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在莆田山区一带活动的红军二〇七团，来了中共福建省委的两位领导和莆田、仙游、惠安、福清、永泰的五位县委书记。晚饭后，他们同队伍一道行军。在即将出发时，王贝同志（注一）“打摆子”（疟疾），站在排中直打哆嗦，那位又黑又瘦的领导看到了，把自己身上的红毛毯披在王贝身上，替他掖好，给他一根竹手杖，又扶他站在排尾，自己排在他身旁，才一道出发。这位又黑又瘦的省委领导是谁呢？

队伍一到驻地，队员们宿营了，这位同志建议立即召开五县县委书记和团领导的联席会议。经过主持会议的团政委王于洁同志（注二）的介绍，才知道他是省委宣传部长王海萍同志。另一位脸色白晰、温文儒雅的领导是省委特派员邓子恢同志。会议室中，燃着松明柴，大家喜气洋洋，团领导心情格外兴奋：两位省

委领导来这里开会指导，二〇七团今后必将更加兴旺发展。

会议开始了，王海萍同志代表中共福建省委作传达报告。报告中批判了“争取一省和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这个口号的错误性质和严重后果，指出当时朱德和毛泽东同志等首倡的红军游击战术，武装割据，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等等都是正确的。他在报告中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比我过去听到的还要透彻。第二天上午继续开会，子恢同志作了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专题报告。他的仪容潇洒，语言生动，有儒将风度，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接着王海萍同志传达省委决定：成立领导五县的闽中特委，子恢为省委特派员兼特委书记，五县的县委书记和二〇七团团长、政委为特委委员。因为子恢在闽西领导过土地革命，担任过闽西苏维埃主席，闻名全国，化名为老李。休会时，有人问起五月间厦门劫狱情况，王海萍只简单地说：“那是省委直接领导，全力以赴，并组织党内有经验的武装干部参加的，前不久二〇七团在莆田澳柄岭突围中牺牲的黄苑团长（福州人，黄埔军校毕业生），就是劫狱的勇士之一。”

当天下午，会议结束，海萍同志连夜要赶回设在厦门的福建省委，临行前和子恢同志叙别，和二〇七团领导谈话，还对我作了一番教诲。这番教诲我听得清，记得牢，但是当时不能深刻领会。在山区的路口，我们送别了他和五县县委书记，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夜色苍茫之中。

一九三一年一月，原省委书记罗明同志调走了，他接任福建省委书记，我也到厦门大学求学。二〇七团领导来厦开会，在王海萍同志主持下，总结二〇七团失败的经验教训。他们住在厦大宿舍，同我又见面了。他们要我暂时在厦大搞学生运动，有什么问题直接请示海萍同志。同年三月十七日——“三·一八”革命纪念日前一天，厦门的反动派害怕这年再爆发类似去年“三·一八”

的千人集会和示威，出动一营海军陆战队，包围厦大学生宿舍，捕去白明新（白克）等十几位学生。我因为住在预科学生宿舍映雪楼，得以逃脱，从南普陀的左侧爬山越岭（当时未筑公路通大生里）到市区，按址找到省委的秘密交通处，请转达我逃脱离校的报告。不久，听到省委秘书处和宣传部被破坏，海萍同志的爱人和其他同志被捕的消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厦大受包围，省委机关遭破坏。海萍同志啊！你现在哪里？你安全无恙吗？被捕的同志呢？能不能设法营救呢？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想不到，一天上午，海萍同志竟然悄悄走进交通处。才几个月不见，他更瘦了，胡子更长了，从前是满脸笑容，这时是十分严肃。他立刻带我离开交通处，穿小巷，走曲径，边走边谈，了解我离校情况，最后说：“你要离开厦门，去福州工作，我也要经福州赶去上海，我俩同船去福州。”他叫我设法买好船票，明天上午九时在海后路邮局对面的××咖啡店（注三）见面。他说的邮局（海南腔）两字，我未听清，他就改说：“Post office”，我才知道他也会英语。隔天上午九时，我们见了面，他又嘱咐我：“下午三时你先从太古码头下船，找到二等舱两人一间的舱房住下，关上房门。如果有人来查问，你就说另一个床位是你爱人的。我在军警检查完毕后才到舱房来。”

果然，军警上岸了，轮船起锚了，在汽笛呜呜声中，他从容镇定地走进舱房。他问：“有没有人来查问？”我答：“没有，可是我的爱人没有来，是你来了。”他知道我同他开玩笑，也笑了。这是两天来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他太紧张太疲劳了，一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两小时后，他醒来坐在床沿，低头沉思。他是在想念被捕的爱人和别的同志么？他是在检查离开厦门前部署的善后工作么？我不敢问，也不该问。轮船在惊涛骇浪中

颠簸起伏，令人头晕目眩，还好我俩都不会晕船。他开始低唱《国际歌》，一遍又一遍，唱得悲壮激昂，唱得我掉下眼泪。他终于哭了，泣不成声。我也哭了，哭我来不及认识却已被捕的同志。一会儿，他擦干眼泪，抬头劝我：“小鬼，不要哭了，革命总是要牺牲的，几个同志牺牲了，还有全省的几千个同志在奋斗，共产党人总是杀不尽斩不绝的。我们来合唱《少年先锋队队歌》吧。”于是我们低声唱了起来：“走上前去吧！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要勇敢地冲上前去，要高举少年先锋的旗帜，我们是英雄的少年先锋队。”唱着唱着，我们的战斗情绪又象火焰般熊熊燃烧了。

到福州后，在南台的一家小吃店，他会见了福州中心市委负责同志，告知省委机关受破坏，交代他们警戒或转移，当天下午赶去马尾，乘船去上海。我在子恢同志的指示下，去马尾搞工运和兵运。以后因为莆田中心县委的要求，奉令回到莆田，参加中心县委的团县委宣传部工作。

一九三一年初秋，福建分设厦门、福州两个中心市委，海萍改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他抽调闽南各县团的宣传部长，开办短期训练班，王贝和我都来参加学习。训练班设在白鹿洞下的一个大石洞中，海萍是唯一的讲师。我们每天中午啃烧饼配泉水，他也和我们一样，毫不特殊。在饭后的短暂休息中，他经常同大家说说笑笑，象老大哥和八、九个小弟弟般的亲亲热热。训练班结束前一天傍晚，我俩并肩漫步下山时，我说：“王书记，你在厦门可能暴露了，为什么不要求去别的地方呢？”他沉吟了一下才说：“不要紧，工作任务第一，个人安危在其次，党中央没有命令调我离开，我怎么能开口请调呢？我们既然参加革命了，就要服从党的需要，不怕苦，不怕死，即使牺牲了，也算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尽了责任。”

一九三二年九月，我因事到厦门找共青团中心市委书记。有一天在中山公园琵琶洲亭上闲谈，我问：“海萍同志呢？他好吗？”“他七月被捕，牺牲了！”我呆如木鸡，肝肠寸断，眼泪直流。反动派去年在鹭岛杀害海萍同志的爱人，今年又杀害对党忠心耿耿、学识渊博的海萍同志。这笔血债哟！何时偿还？……

现在，人民终于解放了，海萍同志的愿望已经初步实现了。我们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奋斗。海萍同志是福建早期党组织领导人之一，他的音容笑貌，我终生难忘；他的英勇牺牲，我永远怀念；他的革命精神，更值得我和大家学习！

注一：王贝，原名张兆通，仙游人，那时十七岁，后改名张兆汉，解放后任福建省委统战部长，现已离休。

注二：王于洁，化名吴梅，仙游人，原名王定清，号静圃，一九三七年六月被叛徒出卖后在福州牺牲。

注三：当时的邮局对面，有八、九家用竹篷搭建的咖啡店，都是海南人开的，其中有的是地下党的接头点。

回忆“四·二五”清江事件

陈元兰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横渡了长江天堑，国民党政府正处在土崩瓦解的前夕。国民党莆田县县长陈文照才到任不久，看到我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非常活跃，严重地威胁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在莆田的统治。陈文照既然来到了莆田，当然也要来个“下马威”，以攻为守地作个垂死的挣扎，妄想维持莆田暂时的“小康”局面。四月二十五日，莆田国民党军队“围剿”清江事件，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发生的。

一九四九年春，地下党莆田县委根据战略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县委办公地点迁往黄石乡附近的清江村。这样做，既扩大了影响，又有利于开展工作。因为清江村的群众觉悟高，基础较好，有许多青年踊跃参加了游击队；地处莆田平原中心，联系南北二洋，“进可攻，退可守”；附近各村也都有党的基础组织，有利于直接联系沿海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并开展活动。但由于当时个别领导同志思想有些麻痹，警惕性不高，革命活动过于公开化，如游击队员有时白天也公开带枪行动。故在群众间盛传：共产党已在清江村建立根据地，准备入城。于是，陈文照千方百计组织一些残余力量，妄想扑灭我地下党组织及其游击队。狡猾的陈文照也经常放出“空气”说，某日某时将去“围剿”清江，届时又没有实际行动，以这样来麻痹和迷惑我们。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左右，我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县自卫大队里当文书的龚文贤同志突然通知我，说今晚陈文照

准备用四个自卫中队的兵力去“围剿”清江村，各自卫队都已整装待发。我接到情报后，即赶到涵江联络站郑兆树同志处联系后，再赶到清江村，向地下党负责人林汝梁同志汇报，林又留我在清江协助工作。当晚，我们游击队五十余人由林汝梁同志率领乘二只溪船，撤离清江村，在附近沟面埋伏隐蔽。但狡猾的陈文照也发觉他们内部有了我们地下党的耳目，当夜突然改变计划，整装而不出发。

二十五日早上，我们全体同志回到了清江村营地（是一座宫庙），继续开展工作。这一天，整天下着毛毛细雨。晚上八时许，游击队队长游飞艇同志自告奋勇要带领全体游击队去破坏敌人在城黄公路沿线一带的电话和电报杆线，经林同意后，即全部出发。当时，营地内只剩下林汝梁、郑兆奎、曾天来、侯文瑄、杨文喜和我等七八位同志。九点许，我问林汝梁，今晚是否要再撤出清江村。林认为整天下雨，敌人应该不会来，大家就睡下了。下半夜，突然枪声四起，我们意识到这必然是陈文照亲自带领自卫队及警察局便衣突击队等，向我们袭击。敌人是分几路向清江村迅速包围而来，其中一路是由县自卫队一个中队从涵江到西洪村；一路是由黄石警察所所长黄国干带领，从黄石到清江村；国民党县突击队队长陈麟等也都直接参加了这事件。当时敌人突然而来，游飞艇同志率领的游击队又分四处破坏电话、电报线路，与敌人猝遇，有的还误将敌人认为同志，因此，我们游击队吃了两头亏。游飞艇同志被捕，当夜被敌人暗杀了。当晚清江村某户有喜事演剧，就有敌人暗探混进来看戏，窥察我们的动静。半夜歇戏后，在戏棚上站岗放哨的游击队员闻到枪声，也赶到营地报告。大家早都起床，收拾文件和枪弹后，即上屋顶抵抗。当时，林汝梁同志考虑到敌众我寡，下令开偏门突围；但偏门已被敌人把守，经我们奋力反击，敌人只好暂退至附近巷口。

最后突围时，只有林汝梁、郑兆奎、曾天来和我四人，带有三把短枪和两颗手榴弹。林汝梁同志带着一把廿发木壳枪，第一个冲出；第二个是郑兆奎同志带一把左轮枪；第三个是我用一把曲九，曾天来同志亦掷出一颗手榴弹。我们冲至巷口，敌人又用机枪射击，故无法冲出。林汝梁同志又撤回从另一条巷冲去，我们三个人仍按着次序跟上突围。走不多远，我因手指受伤，雨后路滑，跌倒在地上，跟不上他们，就爬至附近的豆田内卧倒，以豆丛隐蔽。郑兆奎同志只好避在附近的稻草堆中。林汝梁同志在突围时右腿受伤，避在海堤杂草处。唯曾天来同志涉过海滩，后跑到大洋报信。我们四人都突了围，脱了险。先突围的侯文瑄同志亦脱险，唯杨文喜同志牺牲在海滩上。

那天下午三时许，陈长城和侯文瑄两同志曾由陈桂芳同志引路，带了一些筹募的银元和情报到清江，由林汝梁同志和郑兆奎同志接谈，陈当天即回涵江。二十六日下午，郑兆奎同志突围后，化装到陈长城同志家。据郑兆奎同志说，他因患高度近视眼，冲出后，不便行动，就用稻草遮盖起来，距离国民党军队集中的地点很近，他们退走时的口令声，都听得很清楚。郑在涵江停留二天，白天晚上都更换住宿地点，以后由陈长城同志布置，随交通员带往大洋司令部去。

这次事件，陈文照虽然以比我方多至几十倍的兵力“围剿”我们，想一举“摧毁”我们在清江的根据地，结果是落空了。我的分析是陈文照对我们的兵力摸不清，不知道我们在清江究竟有多少人马，所以当时虽被“包围”了，但我们突围冲出，他们就退至巷口；我们从另一条巷冲出后，他们亦不敢追赶，只用机枪远距离地乱扫射。再则，陈文照率队突入我们营地，发觉我们营地内日常用饭的碗碟很多，而突围的人不多，生怕我们主力队伍埋伏在附近乡村，有反被我们包围歼灭的危险。所以他们在清江也

不敢久留，更不敢留下一兵一卒，充分表现出敌人色厉内荏的窘态。三则，陈文照这次是倾巢出动“围剿”清江，城内兵力单薄，恐被我们袭击，至第二天上午九点，就全部撤回城内。这次，我们无重大损失，主要领导及游击队员同志绝大部份均脱险。经此一役后不久，清江的游击队就全部集中到大洋游击司令部去，养精蓄锐，时解放军已到闽北，我们积极准备，配合人民解放军，迎接闽中地区的全部解放！

（林国泰 整理）

忆念亡友吴钰荪同志

张兆汉

吴钰荪同志离开我们已十余年了。每想起我们相处的日子，历历如昨，哀思忆念，无时或已。

我和吴钰荪同志论交，是傅乃超同志介绍的。那是一九四六年冬，随着国民党政府加紧策划内战，在蒋管区革命势力受到摧残，党为了“保存力量，以利再战，”决定把一些同志疏散到海外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乃由广州经香港到新加坡。当时我住加东，和同乡没有来往，在中学教书。《南侨日报》胡愈老在风下周刊辟青年自学栏，要我负责。吴钰荪同志从傅乃超同志那里知道我的情况，一天，乃超叫一部“的士”，要我跟他去小坡，介绍吴钰荪同志和我见面。自此以后，同乡加同志，我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陵谷沧桑，乃超、钰荪已先后离开人间了。

吴钰荪同志是莆田城郊乡西洙村人，三十年代，进莆田高级中学读书，在先进同学的奖掖培育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四月，福建省委被国民党宪兵破坏，陶耐存、傅韵簪、关庆霖、江家茂和王德华等被捕叛变之后，又沦为国民党的鹰犬，以伪装的面目出现，到处诱捕革命同志。关庆霖带宪兵到江口破坏组织，党组织了打狗团，发动赤色群众把叛徒关庆霖和宪兵围打，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落荒而逃。傅韵簪时在涵中任职员，吴钰荪是学生。这时，吴钰荪同志得到他的亲戚陈长城的帮助送他下船，当时三江口由国民党军队守卫检查极端严格，经陈长城联系，让吴钰荪悄悄地从江滨下船，从此远渡重洋到新

加坡去，在亲戚店中当会计。吴钰荪同志在学校读书时，很喜欢新诗，业余之暇，偶作新诗投寄当地报刊。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和印尼等相继沦陷。吴钰荪和同乡到内地，做一间小生意，解决生活问题，准备过长期隐蔽生活。在艰难的三年八个月中，储有一些钱，日本投降时，回到新加坡经营商业。他同我见面后，屡次要解决组织问题，他说：“那年被叛徒追捕，不得已摒弃了一切，流亡新加坡，自己对党的感情萦怀于心。”我对他说：“你对党的感情，我很理解，此时囿于客观环境，爱莫能助。”他听此话，豁然开朗。一九四七年，国内爆发全面内战，海外广大华侨不明真相，对祖国时局前途十分担心和忧虑。这样一来，介绍国内的实际情况，阐述党的方针，积极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壮大我们的力量，孤立反动派，是我党当时一项十分紧急而重要的任务。这时，党派饶彰枫同志由香港来到新加坡，筹备新华通讯社新加坡分社，饶任社长，我任经理兼《新华周报》督印人。分社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有效地宣传了党的政策，扩大了我党在华侨社会中的影响，在宣传解放区光明政治的同时，还有力地揭露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在新华通讯社新加坡分社筹备期间，吴钰荪和大华行洪骏声、傅维丹、林降祥、吴为忠、柯竹山等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新华周报》和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书刊，通过泗水大华行的关系，在印尼各埠的爱国侨胞代办邮购，很快地扩大书刊的发行量。党的长期挚友庄希泉和傅乃超、刘成鹏等开办捷通行，代理苏联和国内进步影片。吴钰荪和洪骏声等同志也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一九四八年八月，洪骏声、傅维丹、林降祥、吴为忠把大华行收盘，以该行资金二十万港币贡献给党，在港开设裕华行，洪骏声同志由党安排在南洋商业银行任副总经理。吴钰荪同志于一

一九四九年上半年，也由新加坡来到香港，亦把个人资金四万港币贡献给党，顶宝生银行，党安排他任该号总经理，一九五〇年党吸收他为中共党员。

一九四八年秋，在解放战场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并在各地不断取得胜利。一九四九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南洋闽侨同乡庄成宗、黄长水、王雨亭、张楚鸣、郭复和程文铸等举行星五聚餐会，学习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件，吴钰荪同志和林鹤逸、陈福泉亦参加活动，是时，党调我任华南分局直属福建特别支部书记，洪雪立、陈曲水二同志任委员，组织新民主福建建设促进会筹备会（简称福促）为旅港同乡统一战线组织，吴钰荪同志和莆田、仙游郭徵甫、程文铸、陈福泉、林鹤逸、黄克绪等都参加。闽中地下党派林文豪到香港劝募经费，他和程文铸、郭徵甫参与其事，党的挚友林汝良同志任中国防空公司厦门办事处处长，我嘱咐林文豪同志，要林汝良同志联络同事，起义来归。林由厦来港与同事参加两航起义，为该公司起义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解放后，党把宝生银行改为宝行银行，他任该行总经理。

一九六三年五月，我赴日访问，经过香港，吴钰荪同志和郭徵甫到我住处叙旧，他们和庄成宗先生假福建旅港同乡会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他有胃病。大约隔二、三年，他去永安探亲并到福州检查身体，住在华侨大厦，有时到我家吃粥。十年浩劫时期，我和吴钰荪没有通信。后来他到永安探亲来到福州见我，他说因患癌病到广州医院施行手术后已痊愈，惟医生嘱咐每隔三、四个月到医院检查一次，方为无事。但吴钰荪同志因工作紧张，未能去医院检查，他在宝生银行孜孜学习经济问题，研究金融形势，尽管体弱，仍抱病参加工作，直到癌症转移，一九七三年始到中山医院诊治无效，不幸离世，终年五十九岁。